

中西初识

二编

The

First

Stage

of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I)



大象出版社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编

中西初识 二编

The
First
Stage
of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I)

大
家
生
版
社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初识二编/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编.——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2.9

ISBN 7-5347-2611-5

I.中… II.中… III.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
化史-明清时代 IV.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062 号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郭 范 魏 吴

装帧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51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定 价 20.00元

目 录

·论文·

- | | | |
|--------------------------|---------|-----|
| “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 | 严建强 | 1 |
| 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 | 吴伯娅 | 44 |
|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 | 黄启臣 | 67 |
| 同曲异工 | | |
| ——16—18世纪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 | 胡孝德 高小平 | 80 |
| 论 15—19 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 | 庄国土 | 92 |
| 16—17 世纪中叶澳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 万 明 | 114 |
| 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 李金明 | 136 |
| 早期葡萄牙人在福建的通商与冲突 | 廖大珂 | 152 |
| 明代市舶太监的历史作用 | 王 川 | 173 |
| 17—18 世纪俄国来华使节与俄国汉学萌芽 | 阎国栋 | 183 |
| 海西幻人来路考 | 王子今 | 199 |
| 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 | 蔡鸿生 | 214 |
| 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识 | 尚衍斌 | 224 |
| 明代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的中緬战争 | 贺圣达 | 244 |
| ·述评· | | |
| 西方汉学界对开封犹太人调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耿 昇 | 261 |
| 海外明清西洋风美术研究评述 | 莫小也 | 284 |

(荷兰)包乐史著《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评述	聂德宁	299
日本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	乌云高娃	311
后记		320

The First Stage of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II)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Vol. VII

Contents

Theses

The Features and Explanation of "Choinoiserie" in France	Yan Jianqiang	1
A Research on <i>Yijing</i> by Joachim Bouvet, S.J.	Wu Boya	44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s in Europe in the Ming-Qing Period	Huang Qichen	67
The Different Ends of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16-18th Centuries	Hu Xiaode, Gao Xiaoping	80
On Development of Trade Network of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from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Zhuang Guotu	92
Macao's Contribution to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17th Century	Wan Ming	114
The Status and Role of Macao in Foreign Trade during Early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i Jinming	136
Trade and Conflicts: Portugueses in Fujian during		

Early Period	Liao Dake	152
The Historic Role of Shi Bo Eunuch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Chuan	173
Russian Ambassadors to China in the 17-18th Centuries and the Sprouting of Sinology in Russia	Yan Guodong	18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crobats' Coming Route from the Western Ocean	Wang Zijin	199
Kunlun Servants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of the Tang-Song Times	Cai Hongsheng	214
Notes of Se Mu' History Facts in the Yuan Dynasty	Shang Yanbing	224
The Sino-Burma War during the Late Jiajing to Wanli in the Ming Dynasty	He Shengda	244

Reviews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Jew in Kaifeng by Western Sinologists	Geng Sheng	261
Reviews on Overseas Studies of the Western Style Art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Mo Xiaoye	284
A Commentary of L. Blussé <i>Chinese Settlers in Batavia and Sino-Dutch Trade</i>	Nie Dening	299
Studies of <i>Mongolia Secret History</i> in Japan	Wuyun Gaowa	311
Postscript		320

“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

严建强

(浙江大学历史系)

17—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Chinoiserie)构成了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对欧洲诸国的社会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无论就欧洲各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还是就中国文化对各国的具体影响,都并不相同,其间的差异性及其复杂程度,可能超出我们通常的看法。和欧洲一些国家相比,这一时期法国对华贸易处于后进,但“中国热”在法国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在整个欧洲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种矛盾的现象何以产生?为何法国宫廷和社会给予中国文化以特殊的关注?为什么几乎整个18世纪法国知识界会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为什么这种热情到18世纪末又骤然消失?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对“中国热”在法国的特殊表现及原因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中国热”在法国的独特表现

如果仅从器物层面看,当时所谓的“中国热”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明显的表现,精美的中国制造品在荷兰、英国和德国与在法国同样风行,对它们的仿制是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英国生产的壁纸、德国迈森烧制的硬瓷至少和法国马丁家族的漆器一样重要。可是,当我们把视线转到学者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学说的关注方面时,法国作为欧洲“中国热”中心的地位就显得异常

突出。因此,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法国所扮演的角色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当然,这是在把她和与其相邻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德国——进行比较时显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华贸易后进的法国在对待中国文化方面表现出特殊的热情;法国宫廷不仅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亲切的认同感,而且成为“中国热”的积极参与者。

欧亚航路重新开通后,欧洲各国特许公司和商人纷纷来华贸易。这一时期法国对华贸易,虽有科尔伯(Collbert)的努力,还是远落在英国和荷兰之后。法国商船第一次出现在广东海面是在1698年年底。尽管1700年建立了中国公司,但未曾派船来华贸易。1712年,另一家对华贸易公司建立后才派出“尚武号”、“杜路斯伯爵号”和“木星号”抵华贸易。据吴建雍的统计,自1698年法国第一只船到达广州,至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废止的一百三十余年间,法国派遣到中国的商船总共有140艘,而且吨位不大,一般是在550吨到600吨。^① 平均每年不到1.08船次。而我们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可看出,仅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的商船,在1775年至1804年的30年间就达到495艘,而且一般都在700吨以上,尤其是后期,通常要达到1200吨。^② 甚至丹麦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方面也超过法国,在1732年后的75年间,它向中国派出123艘商船,年平均1.64船次。^③

① 参见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第158—159页,辽海出版社,1999年。

② 根据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741—775页所列表格统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③ 参见吴建雍前揭书,第186页,《1732—1807年丹麦亚洲公司组织的中国航行和印度航行统计表》。

然而,正如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法国在对华贸易的发展方面仅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媒介却具有宏伟的影响。”^① 几乎在整个18世纪的欧洲,法国都是“中国热”的中心,从某种程度讲,欧洲各国的“中国热”都受到法国的影响。这种矛盾的现象颇令人寻味。

“中国热”在法国的盛行,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宫廷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一个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行动是,法国宫廷采用了中国人的庆典方式迎接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这不仅反映了法国宫廷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也对法国社会的“中国热”起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一时期欧洲许多国家的宫廷同样盛行“中国热”,但其热烈的程度都不及法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均受到法国的影响。^②

事实上,16世纪下半叶中国商品进入法国,便受到了亨利四世宫廷的欢迎和关注。^③ 路易十三时代的宫廷也盛行中国物品,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和路易十三的宰相马萨林主教都是热心的收集者。马萨林收藏的中国漆器、瓷器、纺织品和艺术品之繁多与精

① 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② 这一时期德意志的“中国热”是如此的法兰西化,以至应培写道:“几乎所有18世纪最初25年的中国情趣无不打上法国烙印。”参见 Oliver Impey, *Chinoiserie*,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7.

③ 亨利四世不仅从东方购进了许多瓷器和纺织品,且从中国买入大量生丝,在里昂创办皇家丝织工厂以满足宫廷的需要。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指示官臣萨瑞为她提供中国式的漆釉书桌和柜橱,还特许一名经营中国商品的商人出入卢浮宫。参见司徒双:《中国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装饰艺术》,载《法国研究》,1988年第1期,第92页。

妙,连路易十四的堂姐蒙邦斯耶夫人都瞠目结舌。^①

路易十四以降的历任国王对中国文化更是情有独钟。有人甚至说“十七、十八世纪初遍及法国的‘中国热’正是由这位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起始的”^②。路易十四非常希望能够联合中国的康熙皇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共同促成东西文化的沟通。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加强对中国的考察和联系成为路易十四的既定国策。1684年9月25日,他接见了随耶稣会士柏应理赴欧的沈福宗。^③在这次接见中,柏应理和沈福宗向路易十四献上由在华耶稣会士殷铎绪、郭纳爵、恩理格等所译的拉丁文“四书”译稿,路易十四指示皇家印刷厂排印出版,这就是1687年出版的精装豪华巴黎官刊本《中国哲人孔子》。1702年,黄嘉略(即Arcade Hoange,本名为黄日升)抵达巴黎时,路易十四指示著名语言学家傅尔蒙(E. Fourmont)向他学习汉语,以便撰述适合法国人阅读的汉语入门书。^④由于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和主管中国事务的大臣蓬夏特兰推荐,他还聘请黄嘉略做自己的中文翻译。^⑤路易十四重视与中国开展直接的贸易往来,为此,1698年,路易十四批准“昂菲特里蒂”号商船首航中国。路易十四还通过在华耶稣会士与康熙皇帝互送礼物,他对中国物品的浓郁兴趣,可从当时王室财产清单中

① 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1658年对这位主教的访问：“他领着两位王后(法国王后和英国王后)和我,走进一条长廊,那里面摆满了应有尽有的宝石、首饰、家具、绸缎……所有中国来的最妙妙的工艺品……我敢肯定法国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精湛的工艺珍品,比博览会的展品还要丰富多彩。”转引自司徒双前揭文,第93页。

② 司徒双前揭文,第93页。

③ 据《风流信使》杂志报道,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了柏应理和沈福宗后,一起“在塞纳河上游览。次日又蒙赐宴”。参见潘吉星:《沈福宗在十七世纪的学术活动》,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第67页。

④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2页,岳麓书社,1987年。

⑤ 可参见许明龙:《法国汉学奠基人之一——黄嘉略》,见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273—287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

众多的中国物品看出。^①这一时期,宫廷的娱乐方式也带着浓郁的中国色彩。路易十四还为他宠幸的蒙特斯邦夫人在凡尔赛花园内建造了特里亚瓷宫。应培写道:“中国风从宫廷吹起,经城市向乡村扩展。早在1673年,即在特里亚瓷宫完工仅两年,《风流信使》就报道,国王的廷臣对国王的情趣上行下效,甚至资产阶级都将自己的花园和住宅改建成逍遥宫。数十年内,这种时尚风行至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②

路易十五也非常重视中国,酷爱中国的艺术、文物与风俗,“在漫长的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中国式舞会和假面舞会继续是宫廷的娱乐形式”^③。路易十五曾命工匠铸造中国铜质字模12万枚,供印刷文书及字典之用。^④1756年,他还象征性地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籍田”仪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me. Pompadour)对中国文化几乎达到了迷恋的程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国社会的“中国热”达到空前程度与这位夫人的身体力行及积极倡导有着密切的关联。路易十六的宫廷也热衷于中国文化,王后马里-安托瓦内特(Queen Marie-Antoinette)修建的“小特里阿农宫”特意让人布置了一个中国式的书房。路易十六登基之际,便任命热衷中国文化的杜尔哥(Turgot)执掌国政。

法国宫廷对在华传教事业非常重视。柯尔贝希望由皇家科学院选派精通科学的优秀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并进行科学考察,

① 据法国国家档案《总清单造册》、《凡尔赛宫家具清单造册》等材料的记载,17世纪法国王室仅细瓷一项就记载中国瓷器千件以上。当时无论在凡尔赛宫、枫丹白露或贡北涅为几座皇宫里,都有完全按中国风格布置的房间。引自司徒双前揭文,第93页。

② Hugh Horour, *Chinoiserie*, p. 57.

③ 同上, p. 100.

④ 参见几内(J. de Guigne):《匈奴土耳其蒙古与西方鞑靼的通史序文》,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32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这一计划由于他的去世而耽搁,但却在其后继者鲁布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 Francois Michel le Tellier)的努力下得以实现。鲁布瓦侯爵乘路易十四接见沈福宗的机会适时地向国王提出了柯尔贝的计划。国王接受了建议,于次年3月将洪若翰(Joanne de Fountaney)等五位“国王数学家”派往中国传教。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与宫廷及科学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进入中国后,不仅导致了在华耶稣会士国籍比例的重大变化,也导致了耶稣会中所撰中国报道的著述比例出现了以法籍传教士为多的局面,^①保证了法国社会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中国的信息,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传播中国消息的主要来源。这种中心地位有助于法国社会“中国热”的持续发展及其对欧洲各国的影响。

法国社会盛行的“中国热”还表现在这一时期法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酷爱中国文化,甚至视中国为楷模的人物。属于被舒姆佩特(J. A. Schumpeter)称为“顾问官员”那一类人的马萨尔·沃邦(Marshal Vauban)元帅于1707年曾匿名发表了《关于设置王家什一税,取消人头税、间接税以及各省之间关税等的计划》,书中强调了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指出造成法国农民悲惨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租税的繁重,因此必须参照中国的经验进行经济改革。他建议对一切收入和一切等级都实行国王的什一税制,这种什一税不同于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那种宗教捐税,而是指征收农业收成和工业产量的十分之一,它“与所报道的中国的习惯做法是完全一致的”^②。为了劝说路易十四重视农民的处境和各阶层的经济状况,他将自己在各地实地考察的结果,用百分比的形式进行介绍。但他认为仅仅这样估计是不精确的,应当像中国政府

① 参见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第40—4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② 参见 L.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 120, Texas, 1946.

那样对人口事先进行统计。^①曾任法国财政总监的西鲁哀特(Silhouette)则于1731年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政体与道德的总体看法》，赞美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他认为中国的皇帝拥有专制的权威，但这种专制只是表明皇帝像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大家长而已。他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尤其表示欣赏，认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自然法的原则是“一切法律的基础”^②。

在这些对宫廷决策具有影响的人物中，最典型的当属贝尔坦(Bertin)和杜尔哥。贝尔坦在当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特别羡慕中国专制君主的权威和帝国的稳固，他在其国策的制定中每每以中国为楷模，希望建立一个像中国一样的稳定繁荣的君主制国家。他看到了中国政治哲学中人民应当服从君主的观念有益于巩固其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将中国思想移植于法国人民。贝尔坦对中国物品的迷恋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与在华耶稣会士，尤其是钱德明神父(Jean-Joseph Marie Amiot)建立了长期的通信联系。^③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中国物品成为他的珍异品陈列馆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其间还珍藏着许多由钱德明神父为他收集的各种中国乐器。^④杜尔哥则强调中国楷模中的另一方面：成熟的农业管理。从其改革实践来看，他强调通过法中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互相交换工农业资料和产品，并借鉴中国农业管理的经

① 参见 Vauban, *Dixme royale*, 载 Eugene Daire's, *The major works of the Economistes-financiers du X V III e sié cle*, pp. 34—35, 转引自 Nannerl O. Keohane, *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in France: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pp. 330—33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0.

② 据艾田蒲(Etiemble)的观点，尽管此书十分平庸，且抄袭了耶稣会士的资料，但不乏价值，至少它的编撰者是那位于1759年3月4日至11月21日担任财政总监的人物。参见艾田蒲著，许均等译：《中国之欧洲》，下册，第32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钱明德神父给贝尔坦共寄了80封信，可参见《致贝尔坦大臣的80封书简集》。

④ 参见陈艳霞著，耿昇译：《华乐西传法兰西》，第202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

验和工艺技术来繁荣法国经济。杜尔哥与两位被称为“杜尔哥的中国人”高类思和杨德望的交往也反映了他对与中国沟通的迫切愿望。1763年,当他得知这两位中国青年完成其基督教教士培训计划准备回国时,说服贝尔坦以政府的名义邀请他们续留一年。在他们启程回国之前,杜尔哥写成了《中国问题集》和《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两本书,无论就其材料来源,还是其撰写目的,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他在1766年至1774年期间的有关信件中可以看出,此二书主要是为这两位中国青年而作,旨在帮助他们理解和考察本国经济状态与制度,并向法国报告。^①

需要指出的是,宫廷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主要的还是局限于生活的享乐和追求异国情趣方面,它对法国社会“中国热”的推动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这或许也是法国社会“中国热”深入民间,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的一种民俗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些大臣和顾问官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大多在他们担任政府职务之前,也有些只是出于个人情趣方面的原因,但在一个时期内政治舞台上出现许多中国文化的热心者,这在其他欧洲国家是少见的,这不仅是法国社会“中国热”的一种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热”的发展。

2. 法国知识界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关注,尤其涉及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思想。法国知识界还就中国文化的评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艾田蒲认为,18世纪上叶,欧洲哲学家主要是参照中国来思索上帝和灵魂、物质与精神等观念。18世纪中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德·阿尔让斯(D'Argens)援引中国的言行来批评西方的宗教

^① 1766年12月9日杜尔哥致杜邦的信中写道:“我已为我向你提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见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狂热与政治体制,之后,又有重农主义者颂扬中国经济并提倡将它作为全欧典范。^① 尽管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参与了这些讨论,但这三方面争论中,无论是参加的人数,还是所造成的影响,都以法国为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国、德国与法国的比较中看出。

在启蒙时代的英国,有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马修·廷德尔(Mathony Tindal)、兰姆塞(Chevalier de Ramsay)和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等人谈到过中国,引用过孔子的话,并对孔子表示过好感。启蒙时代英国学者在利用中国材料方面主要表现在倡导自然神论的学者和传统护教者之间的争论中。自然神论者柯林斯、廷德尔和兰姆塞都把中国文化作为说明自然神论、批评启示宗教的思想材料。总的来说,在思想方面,英国是当时较小受到中国影响的地区。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然而从大体来看,中国思想在英国的影响,比较大陆方面,不无有相形见绌之感……”^②

在德国,热爱和宣传中国文化的学者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主要有门泽尔(Christian Mentzel)、米勒(Anreas Mueller)、莱布尼茨等,尤其是莱布尼茨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浓厚兴趣,他是西方世界最早系统地利用中国文化方面的人,在形而上学、自然神论和道德哲学方面,他都对中国材料表现出持续和强烈的兴趣。孔子的学说、《易经》和理学的许多观点,或者为他的设想提供了证明,或者直接启发了他的思路。由于他的重要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倡导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德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只局限于较小的范围,而且他们常有不被社会理解的孤独感。米勒因为出版了关于中国文字的著作《中文之钥》而被攻击为离经

① 参见艾田蒲前揭书,下册,第325页。

② 朱谦之前揭书,第196页。

叛道^①，1707年莱布尼茨的一位弟子弗朗克(A. H. Francke)在赫利东方神学院设立中文课程就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方面最典型地体现在沃尔夫被逐事件中。1721年7月12日他在哈勒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赞美了孔子，赞美了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是他所积极倡导的。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与虔诚派的正统神学派冲突的焦点，并最终导致了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发布驱逐令。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指出：“当时的德意志，虽然一部分的先觉者之间，倾倒于中国的文物，出有重视其研究的人物，但是一般思想界与学界，对于那一点，尚未下以十分的注意，例如克拉普洛特(Julius Klaproth)、摩尔(Mohl)、讷伊曼(Karl Neumaan)等初期的中国学者，皆相率而去之于法、俄、英等国，这个事实，便表现出世相之一端。”^②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都不曾有像法国那样巨大的对中国文化富有兴趣并开展研究的学者群体，更没有像法国知识界那样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并就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评价展开争论。

相比之下，在法国知识界，介入中国问题争论的学者不仅人数多，讨论的内容也更加深刻和广泛。他们遵循着艾田蒲所述的三个方面，将争论不断地向纵深推进，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持续性。

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围绕着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启示与信仰及宗教宽容等问题，法国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应利奥纳(de Lionne)神父的邀请，写了《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他从利奥纳神父的介绍和龙华明神父

^① 参见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13页，中华书局，1994年。至于《中文之钥》为何没有出版，情形很复杂，可参见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Stuttgart, pp. 112—129, 1985.

^② 石田干之助著，张宏英译：《中西文化之交流》，第144页，商务印书馆，1941年。